

•智库要闻•

编者按:众所周知,一流的城市,应当拥有一流的大学。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在打造“现代名城”的伟 大工程中,建设一所名校便成必然。历史的发展将目光聚焦到苏州大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州大学致力于成为与苏州国际声誉和地位相匹配的知名大学,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的需要,更是自身的奋斗目标。2014 年 9 月 10 日,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视察苏州大学时指出:“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名城,离不开百年名校苏州大学的支撑。”于是,苏州与苏州大学融合发展的“名城名校”发展战略便应运而生!

正是在这一伟大的时代背景下,《对话苏州发展》诞生了!

《对话苏州发展》“2014·法治苏州”活动在我校举行

12 月 11 日上午,由我校主办、苏州 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苏州大 学东吴智库承办的《对话苏州发展》 “2014·法治苏州”活动在天赐庄校区图书 馆举行。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与嘉宾有:江 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市委 副书记、市长周乃翔,市政协主席高雪 坤,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福龙,市委 常委、秘书长王少东,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蔡丽新,市人大副主任顾仙根,苏州 市副市长王鸿声,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 跃进,市政协副主席季忠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叶兆伟,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王君悦,以及苏州所辖市区、 市政府、市人大等相关部门的领导;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 授,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孙笑 侠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 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朱 新力教授;我校校领导王卓君、朱秀林、 袁银男、路建美、田晓明、陈一星、熊思 东、江作军、杨一心,相关学科教授及“东 吴智库”研究员,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会 议由校党委书记王卓君主持。

王卓君对各位领导与专家的莅临表 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苏州大学在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推动苏州经济转型升级的 同时,一直努力充当苏州经济发展的思想 库、辐射源和人才基地。《对话苏州发展》 作为实施名城名校的重要抓手和平台,通 过汇聚相关领域的高端专家学者进行对 话交锋,致力于为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 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咨询服务。今年的主 题聚焦于“法治苏州”,既是对党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决定的积极呼应,也是苏州 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周乃翔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苏州 市也正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法治苏州 建设,努力使法治成为苏州和谐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和内容。高等院校和法学专 家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苏州大学长 期以来围绕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等 领域,积极建言献策,为提升苏州法治建 设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表示,将认真 听取与会知名专家的意见,吸收转化成 为法治苏州建设的具体举措,希望各位 专家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同时也 表示苏州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点建设 “东吴智库”,以此作为重要的校地合作 平台,希望苏州大学继续深入实施“名城 名校、融合发展”战略,积极为苏州改革 发展、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随后,与会专家们围绕“法治苏州”主

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发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教授从新加坡的法治与治理谈起,介 绍了新加坡法治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建 设与发展的重要经验,以及从中获得的 对建设法治苏州的重要启示。复旦大学 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孙笑侠教授就“法 治思维要义”为题作了发言,着重强调了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提出要把法治作为 一种思维方式来推进改革、促进发展。北 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围绕“市场 主体经济自由权的法律保障”的主题作了 发言,认为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保 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权,弄清私权利与公 权力,让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市场经济 发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新力教授以“法治苏州,来自法治浙江 的感悟”为主题,畅谈了浙江的法治建设 经验和感悟。

本期要目

- 《对话苏州发展》“2014·法治苏州”活动在我校举行
-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受聘我校东吴智库顾问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做客东吴大讲堂
- 以建设法治型党组织为引领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
- 建设以法治支点撬动改革发展 国内外知名学者苏城纵论法治“经”

·智库要闻·

我校专家学者王卓君、胡玉鸿、金太军、方世南、陈立虎、黄学贤、沈同仙七位教授分别就“政府权力清单和法治苏州建设”、“法治理念纳入苏州国民教育体系的思考”、“苏州创新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对策”、“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法制意识是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关键”、“谈谈自贸区建设的法律问题”、“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全力打造法治苏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等内容作了主题发言。

石泰峰在最后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新型智库建设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务必将东吴智库打造成务实、高效的高校智库,使一年一度的《对话苏州发展》成为苏大与苏州双方合作的重要

平台,今年选定“法治苏州”作为《对话苏州发展》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举措,对苏州新一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政府是打造苏州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点,要实施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打造苏州的新优势,必须要搞法治。要让法治作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把“法治苏州”作为新一轮发展的目标,也是苏州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在谈到如何全面推进法治苏州时,石泰峰强调,要鲜明地提出建设法治型党组织,做到依法执政,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要以建设法治型党组织为引领和保障,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他最后表示,要推动

法治,除了需要党组织和政府的工作,还要有社会认同,要让法治苏州的概念在党组织、政府、社会、企业中成为大家的共识。只有让法治成为共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和推进法治。

《对话苏州发展》“2014·法治苏州”活动结束后,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图书馆前合影留念。

据悉,《对话苏州发展》是以苏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活动主要围绕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发展战略,每年选择一个主题进行研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苏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著名企业家、我校相关学科教授及“东吴智库”研究员参与,研讨成果也将集结出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做客东吴大讲堂

12月11日下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先生应邀做客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院“东吴大讲堂”,在学术报告厅为全校师生做了题为《习近平与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副校长田晓明教授主持。

田晓明热诚欢迎郑永年教授的到来,并作了简要介绍。郑教授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具有学贯中西的国际视野,在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方面造诣颇丰。先后出版专著、主编学术著作多部,历任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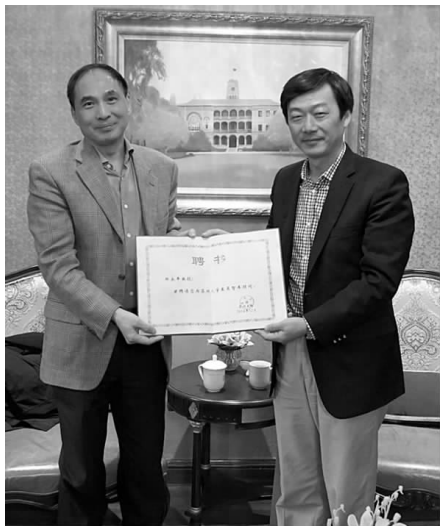
作家。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郑永年教授在随后的讲座中指出,新中国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在前面的65年中,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令世界瞩目、令人民骄傲的成绩。基于发展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中国亟须解决的是未来的35年的发展规划问题。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法治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必须整治腐败。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指出,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在最后现场提问环节中,与会师生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问题,向郑永年教授请教,郑教授睿智地解答,赢得了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受聘我校东吴智库顾问



12月12日,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做客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与东吴智库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畅谈智库建设和发

展经验,并受聘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顾问。我校副校长田晓明、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母小勇以及东吴智库相关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共同参加了座谈活动和受聘仪式。

座谈活动伊始,田晓明副校长向郑永年教授介绍了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成立的缘起,并指出苏州大学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道路上走在了前列,学校在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学校始终坚持“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以双赢促合作”的办学理念,在精心守护精神家园的同时,勇敢地推倒了大学“物理围墙”,密切与地方政府和行业的联系,广泛开展校地、校企合作,探索合作双赢、良性互动的办学机制,东吴智库的建设正逢其时且愈发蓬勃繁荣。

郑永年教授解释了中外智库建设的区别,重点介绍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在智库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详细讲解了智库建设在发展模式、团队组建、财政支持、日常管理、合作机制、政策规划等方面的内涵。他还结合苏州大学的发展现状,提供了东吴智库发展的一些建议,建议东吴智库结合学校自身文科发展的特点,重点抓住几个重点研究方向,突出特色,持续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服务。他相信,在良好的轨道上的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一定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有特色的高水平的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

东吴智库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还就一些智库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向郑永年教授请教,郑教授一一做出详细的解答。

最后,田晓明副校长向郑永年教授颁发了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顾问聘书,并再次衷心感谢郑教授对东吴智库发展的关心和帮助。

•媒体聚焦•

编者按:12 月 11 日,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举办首届《对话苏州发展》论坛,国内外专家齐聚苏州,共话苏州法治建设。教育部社科网、江苏政府法制网、光明教育频道、《姑苏晚报》、江苏广播电台、苏州新闻综合频道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现转载 2014 年 12 月 12 日《苏州日报》刊发的文章,以飨读者。

石泰峰在首届《对话苏州发展》论坛上强调 以建设法治型党组织为引领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建设



12 月 11 日上午,苏州大学举办首届《对话苏州发展》论坛,国内外法学专家围绕“法治苏州”积极建言献策。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石泰峰到会听取专家发言并讲话。他强调,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建设法治苏州,就是要以建设法治型党组织为引领和保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真正让法治成为苏州继续保持率先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乃翔在致辞中说,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依法治市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法治苏州建设。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主持论坛,并作了《政府权力清单和法治苏州建设》主题发言。

《对话苏州发展》论坛由苏州大学主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承办,旨在为苏州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企业发展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咨询服务。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

院长朱新力等专家学者,分别针对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建设等课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国内外知名学者、苏大相关学科教授等近百人参加会议。

石泰峰在总结发言中说,以“法治苏州”作为《对话苏州发展》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举措,对推进苏州新一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们的精彩观点,对于法治苏州建设有很多启发,我们将认真消化吸收。石泰峰说,全面推进法治苏州建设,是我市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去年经济总量达 1.3 万亿元,人均 GDP 达 2 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 70%,按照最新标准,苏州已经跨入特大城市的行列。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产业层次还不高、世界级的领军企业不多、资源环境承

载面临不小压力、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苏州未来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只能依靠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打造苏州新的优势。新加坡、香港等先进国家和城市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发展必须要有法治保障,下一步,苏州将加大法治苏州建设力度,让法治真正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苏州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成为苏州文化精神的重要特色,成为苏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引领,成为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石泰峰强调,全面推进法治苏州建设,就是要以建设法治型党组织为引领和保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首先要建立法治型党组织,其次,法治政府与法治市场要一体化推进。对于政府来说,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全社会要把法治作为共识,作为大家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予以更好地建设和推进。

市领导高雪坤、曹福龙、王少东、蔡丽新、顾仙根、王鸿声、张跃进、季忠正等出席论坛。



• 专家点评 •

编者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苏州一直“走在前面”,为海内外所瞩目。在新一轮改革发展进程中,苏州如何保持既有优势,继续提供创新发展经验,不仅为世人所关注,也是自身发展之诉求。在我校东吴智库举办的《对话苏州发展》论坛上,围绕“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等现实问题,国内外知名学者展开热烈讨论。

以法治支点撬动改革发展

国内外知名学者苏城纵论法治“经”



郑永年,浙江余姚人,政治学博士。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
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有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
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

主要研究成果有:《未竟的变革》《影子里的中国》《中国改革三步走》《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
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中国的“行为
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
义:现代化、身份认同与国际关系》(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等。

新加坡的法治与治理及其对苏州的启示

在《对话苏州发展》论坛上,郑永年首先作了《新加坡的法治与治理及其对苏州的启示》主题演讲。他提出:新加坡最成功的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苏州可以学习新加坡的有益经验。

郑永年说,新加坡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依靠法治规范明确了政治的位置及边界,政府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使得新加坡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每十年一次的产业升级。此外,新加坡的法治非常重细节,而中国的法治没有细

节,如法律条文、学生手册等都是用抽象的言语表达的。

郑永年认为,也许中国完全照搬新加坡模式不可取,但如果中国的城市能学好新加坡经验,国力定能提升一大步。



孙笑侠,浙江温州人,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哲学、公法学研究。出版《程序的法理》《法的现象与观念》《法律对行政
的控制》等学术著作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次获
得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司法部等优秀科研成果奖。

让法治成为一种思维

孙笑侠在论坛上聚焦的课题是《法治思维要义》。17年前,我国就提出过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法治”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再次被屡屡强调。孙笑侠

认为,前后 17 年,虽然都在说依法治国,但其中法治的含义有所不同。

17 年前的依法治国,只是把法律当工具,属于外在一层的理解;而如今的法治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是执行者的思维模

式,一个办事的路径。因此,现今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改革、促进发展、解决纠纷。其实,老百姓也是一样,要把法治内化成一种精神,而非遇到困难再去求助的一本专业书。

• 专家点评 •



张守文, 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获美国 GE 经济学奖, 教育部首届“优秀青年教师奖”, 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经济法理论, 财政法与税法研究。出版《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税法的困境与挑战》《经济法理论的重构》《税法通论》《财税法》《财税法疏议》《财税法学》《经济法学》等学术著作三十余部, 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成果曾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司法部首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一等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二等奖、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司法部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钱端升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对苏州下一步的经济发展, 张守文认为, 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权。

在二元配置的关系中, 从市场的角度讲, 更多的是关注如何促进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从政府的角度是如何促进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结合苏州实际情况, 张守文说, 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权, 政府的作用应是弥补市场秩序, 地方党政要把眼光放在市场监管上, 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当然, 法治也要对经济自由权

做一个界定, 即在国家和政府依法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出限制。张守文还提出, 除了法治, 还可以加强教化, 通过道德手段规范市场秩序。



朱新力, 浙江桐庐人, 法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主要从事行政法学、政府管制、行政诉讼法学、国家赔偿法学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十余项, 出版《行政法学》《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外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等学术专著十余部,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浙江省政府哲社优秀成果奖和司法部教材与科研成果奖。

法治苏州, 来自法治浙江的感悟

朱新力从法治浙江的经验出发, 谈了他的看法。

朱新力说, 英美等国家都有发达三大法宝: 经济市场化, 政治民主化, 社会法治化。前几十年, 我国学习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 人民生活富裕起来, 如

今再谈改革, 不妨继续学学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

朱新力认为浙江的法治建设有三点经验值得苏州学习。第一, 民主政治, 如推行民主恳谈会, 让人人都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第二, 浙江的立法注重本地

个性, 相对更科学; 第三, 政府法治建设, 如现今浙江省政府正在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 权力清单即是各项政务公开, 一张网叫做政府服务。



王卓君, 江苏宜兴人, 管理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江苏省委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江苏高校人文社科校外研究基地“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主任, 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从事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 出版《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科技创造心理学》《科学认识论史》《中国大学外部经济关系研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服务型政府研究》等学术著作十余部, 译作有《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政府权力清单和法治苏州建设

王卓君认为: 法治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实现路径。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法治化建设的必要准备和必然要求。目前三大治理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 其核心实际上在政府。公开权力清单, 对法治政府的建设

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各方监督。苏州正在完善行政权力清单管理的工作机制,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大力推进行政权力裁量基准工作; 二是行政权力库的动态维护机制; 三是完善行政权力管理的部门对接机制; 四是拓展行政权力的公开

方式; 五是推动行政权力网上运作。最后王卓君对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既要权力清单, 更要责任清单。二是既要权力清单也要权利清单。三是既要正面清单, 还要负面清单。

·专家点评·



胡玉鸿,江西南昌人,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江苏省法学会副会长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曾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优秀教师,苏州大学教学名师,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学方法论研究。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以人为本与中国法制发展》首席专家。出版《法学方法论导论》《司法公正的理论根基》《个人的法哲学叙述》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其中《法学流派的人学之维》专著入选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十余项。

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

与其他与会专家不同,胡玉鸿将法治话题延伸到了青少年身上。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谈了将法治理念纳入苏州国民教育体系的思考。

根据胡玉鸿团队的调研,目前我国

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宪法意识,二是权利意识,三是安全意识。相对来说,学生的安全意识最高,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诱惑增多,中小学生的守法意识存在下降趋势。

对于国民教育的法治理念,胡玉鸿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其次,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格局;再者,充分发挥学校在法治教育当中的阵地作用。



金太军,安徽全椒人,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曾任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等。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江苏省“苏南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与公共治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出版《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等学术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被引用9000多篇次,研究报告曾获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研究成果多次获得教育部、江苏省优秀成果奖。

苏州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对策

金太军在发言中指出,苏州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三个挑战:社区与社会组织由于资金等问题运行困难;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低效;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关注)不足。金教授认为苏州在法治的轨道

上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基层党建工作带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通过选拔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培养专门人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二是完

善社区的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实现政社互动衔接;三是凝聚社会力量,引导企业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四是充分发挥专家在社会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方世南,江苏张家港人,现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江苏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苏州市专家咨询团团长。江苏省首批“333工程”培养人选,苏州市首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地方政府与公共管理等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出版《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先进文化与小康社会》《时代与文明》专著20余部,在《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论文《论小康社会的先进文化建设》入选“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胡锦涛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报告会。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法治意识,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

方世南教授领衔的团队在承接中组部的重大课题时,先后研究了苏州市农村支部书记的能力建设,其中涉及到农村支部书记的法治意识,法治水平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基层党组织既

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是实践者和示范者。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战略任务考量着基层党组织的法治建设水平,只有大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法治意识,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法治型党组织,才能切实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水平。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法治构建,方教

授认为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四型”党组织即法治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二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是根本。三是要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均等化,要做好围绕民生为重点的一系列的法治工作。

• 专家点评 •



陈立虎,法学硕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中国涉外经济法等研究。出版《对外贸易的行政法律制度》《现代国际贸易法》《国际环境法导论》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在《法学研究》《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

自贸区的法律问题

陈立虎教授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区分两类自贸区;二是处理好自贸区的三个问题;三是自贸区建设与苏州举措。自贸区分两块,一个是国内自贸区,一个是国际自贸区。在自贸区建设问题上,陈教授提出要处理好三类关系:一

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二是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关系;三是改革的积极性和立法的迫切性。随后他指出了苏州在应对自贸区建设这种客观的经济形势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苏州应该因地制宜,不能全面拉开,不能完全照搬其

他地方。第二在贸易便利化,科技开放等方面做文章,做好市场准入,事后监管,处理好经济增量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第三在制定苏州关于自贸区方面的制度,立法的时候要考虑苏州的政策法律和省人大政策立法的衔接。



黄学贤,江苏扬中人,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带头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苏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苏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主要从事行政法学基本理论、行政程序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出版《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跨入 21 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比较行政法——港澳台行政法析论》《行政诉讼:基本原理与制度完善》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在《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全力打造法治苏州

黄学贤教授指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个总的部署,其中依法行政因其广泛性、强制性、主动性等特点处于核心地位。行政执法体制不顺、行政执法思维方式陈旧、手段单一;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不符合现代行政

程序的问题;法制统一性不够、政令不畅通;政府纠纷解决机制不顺畅;行政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还有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是法治政府建设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因地制宜地加快苏州法治政府的建设?黄教

授认为:一是完善立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有力的依据;二是严格执法,全力打造法治政府;三是公正司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强大的司法保障;四是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为法治建设提供积极的文化支撑。



沈同仙,江苏宜兴,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法学会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江苏省社会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员、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主要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保险法研究。出版《劳动法学》《中国公民劳动权利保护》《经济法学》等著作和教材 20 余部;在《中国法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主持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

沈同仙教授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苏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面临的挑战。二是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三个层次,三是社会组织是苏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她指出:现在苏州在劳动关系上面临劳动争议的群体性数量爆发性增长、权利诉求向利益诉求转化、司法外的维权增多等问题,所以需要

要政府在劳动关系上把握好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就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基准,这些最低基准必须要实施。第二个层次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中观层次,也是一个市场层次,它是通过劳资双方的对话协商来达成的。第三个是微观层次,劳动者个人同企业去协商,同用人单位协商,然后建立个人的劳动合同。沈教

授认为,社会组织作为中间层次是和谐劳动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当社会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以后,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模式:法治社会化,政府小政府,市场自由,当政府退出有关方面的监管以后,应该由社会力量补充,这个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们苏州法治建设的一大亮点。

·权威视点·

编者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我国智库发展出现令人欣喜的快速发展迹象，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不足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就中国智库的下一步发展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王教授认为：思想是历史变化的构成性力量，智库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源头，它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权力的高度结合，构成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重要力量，智库建设应从“形式”转向“内容”。现将主要内容转载如下：

“智库形式建设”亟需转向“智库内容建设”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

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去年作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批示后，再次对智库建设做出的更深层次阐释和表态。

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出现令人欣喜的快速发展迹象，智库热席卷全国。另一方面，在这股智库热潮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不足和问题。应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发展？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下全国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智库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库建设，更多的资源也涌向智库建设。但有人对当前智库热中的一些现象表示了担忧。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智库发展中，有不少只是现有各类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或者包装，是搭台子、请名人、开峰会、出简报，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公共政策问题专家。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智库发展的态势？

王莉丽：中国的现代智库研究与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应该说已经充分了解了全球智库的形态和表象。但目前对全球智库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停留在“智库形式”阶段。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欣欣向荣，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近年来新兴的一批智库很擅于进行思想的传播。但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智库存在的核心

价值就是通过思想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进步。一切的思想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当前，中国智库的着力点亟需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

另外，关于智库概念和定位的探讨，这是学界和业界多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我认为，智库概念不宜过于泛化。主要是指，以政策研究、战略研究为己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不是智库。这一点必须明确。

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三大类。在三类智库的角色定位上，考虑各自优势与劣势，官方智库有着信息获取和信息通道的先天优势，可着眼于紧迫性政策研究；大学智库相对独立，但其核心研究人员大多担负着学术研究、教学、育人、政策研究的多重任务，因此，大学智库应根据自身特点，着眼于长期跟踪研究和战略研究；民间智库当前的发展可以更多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舆论通道与平台的重要角色，而且在公共外交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优势。

打开智库“旋转门”的另半扇门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何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相关性是智库建设中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广为人知的美国“旋转门”机制，不只是简单的因党派执政更迭而产生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职位互换，更重要的是，智库工作往往会促进人才的全面社会交往与思考能力的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这一做法是否有可资借鉴之处？

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为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人才更

迭提供了便利通道，促进了知识和政治的有效结合，使得智库更是成为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对中国而言，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与政府官员就某一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并建议时，他们通常会认为学者的研究与政治决策以及政府的考虑有着一定距离。

如果中国的“旋转门”正常运转起来。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这个距离就可以弥合了。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也将有利于中国的人才流动，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因为，一个社会的阶层出现固化势必影响社会稳定，中国的“旋转门”机制将是解决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举措。

提升我国智库新媒体传播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是下一步智库发展的方向，您认为除了加强智库内容建设之外，应如何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王莉丽：一个重要的但是又被大家所忽视的问题是：当前中国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依然很落后，与欧美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新媒体传播国际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数据统计的。中国智库需要在整体上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首先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具备全球视野，把智库的网站打造成传播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

（据2014年1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东吴艺谭•



留点念想

——《东吴名家》(东吴艺谭)之序言

田晓明

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而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在惊诧之余,也就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何在异国他乡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去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参加了“2013 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建国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失

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天灾人祸”,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具有了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性等特征。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却又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

“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之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在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

·东吴艺谭·

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为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字、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徽、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主持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令我“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拥有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

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著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著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一年前,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便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便诞生了!

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我不能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最终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

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传统,将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弘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东吴艺谭”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东吴艺谭•



梁君午:出生于四川,祖籍台湾,西班牙华人画家。1949 年,随父母到台湾,自幼热爱绘画艺术。1968 年,应蒋经国先生力荐赴欧洲学画,考入西班牙马德里圣法南度高级艺术学院 (Escuela Superior De Bellas Artes desan Ferando de Madrid),师从西班牙世界著名画家 Antonio Lope 和 Pedro Mozos 等人。大学三年级时,在西班牙 Macarron 画廊举行第一次个展。1973 年,以“荣誉注册”的最高成绩毕业,并获得西班牙国家教授资格文凭,其在校期间的作品被学校收藏,作为教学参考教材。1978 年,梁君午应西班牙艺

坛三大画廊之一—Kreiser 画廊之邀参加“Figuraction 78 联展”,并成为该画廊主席位中的一员,从此开启职业画家道路。梁君午以绘画人物见长,尤其善于勾勒女性。他的作品十分重构图和色、光的运用,透露出浓厚的东方意境。数十年间,梁君午的作品展遍布欧洲、中南美洲、北美洲、亚洲等地,他的名字也以 20 世纪当代画家的身份被收录进《西班牙的艺术词典》,并获得西班牙国王璜·卡洛斯一世 (Juan Carlos I) 在马德里 Zazuela 皇宫观见的殊荣。



张朋川:江苏常州人。1956—1960 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1960—1965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至甘肃省博物馆考古所工作,主持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等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和参加了嘉峪关、酒泉地区魏晋壁画墓和甘肃古代岩画的考古工作;主持和参加了嘉峪关墓室壁画、酒泉丁家湾墓室壁画的临摹工作。1983 年后陆续担任甘肃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副馆长。2000 年进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现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苏州大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吴门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艺美术研究院、江苏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文物局西北四省一级文物鉴定组专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

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中国彩陶图谱》、《黄河上下——美术考古文萃》、《中国汉代木雕艺术》、《平湖看霞——关于美术史和设计史》、《<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等专著十多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美术全集·陶瓷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以及《中国园林之旅》等书撰文章和词条,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个人专著《中国彩陶图谱》获 1992 年中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和 1993 年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最高奖;《中国汉代木雕艺术》获 2003 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三等奖,《黄土上下》获全国第十六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奖”一等奖。



华人德:笔名维摩。祖籍江苏无锡,“九三学社”社员。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社”,推为首任社长。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大学,1983 年调入苏州大学。1987 年发起成立“沧浪书社”,推选为首、二届总执事。1993 年至 2007 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现为苏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中国书法史和碑刻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1986 年,书法作品获第二届“中青展”最高奖;2005、2007 年分别于美国惠特曼学院美术馆和泰国曼谷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2002 年,专著《中国书法史·两汉卷》获“首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编著《兰亭论集》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与白谦慎合得);2006 年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一等奖;2013 年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是迄今为止获“兰亭奖”最多的书法家。于《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和香港《书谱》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书法和图像方面的著作十余种。2003 年,专著《中国书法史》七卷本 (华人德著其中“两汉卷”)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策划组织几十场书学研讨会,其中“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成为书学界的品牌。从 2011 年起,率领“苏州书法代表团”频繁出访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并于当地举办“吴门书道书法展”。

•东吴艺谭•



杨明义:江苏苏州人,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1981 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1987 年赴美留学毕业于纽约青年艺术学生同盟。1999 年回国,现居北京。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文化部国韵文华书画院副院长,海华归画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艺术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客座教授,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杨明义创造性地用水墨风格表现江南水乡,形成鲜明独特的个人画风,得到海内外艺术界和收藏界的高度评价,先后获“中日书画交流展金奖”、“20 世纪亚太艺术大展银奖”、“世界华人艺术大奖”、美国亚太艺

术中心颁发的“20 世纪艺术贡献奖勋章”、“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等,出版有《水墨水乡》、《近日楼散记》、《水墨之旅》、《杨明义画水乡》、《江南百桥图》、《诗画江南》、《绝版的江南》、《杨明义画周庄》等 40 余部著作和画册。1978 年因创作《水乡的节日》在写生中发现周庄,并把周庄介绍给世人,被誉为“发现周庄第一人”,并获得周庄“荣誉镇民”称号。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江苏省美术馆、苏州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敦大英帝国博物馆等众多中外美术馆、美术学院和美国前总统布什夫妇等社会名人收藏。



杭鸣时:祖籍浙江海宁,出生于上海,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曾任苏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水彩画(含粉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水彩、粉画展评委。杭鸣时粉画艺术馆馆长、教授。其艺术创作共分三个阶段。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攻水彩,1956 年《维吾尔族老人》一炮打响,在全国青年美术展上获三等奖。随后,《农村俱乐部的小读者》、《东北大娘》、《小女孩》、《井冈山象山窟》等作品相继作为水彩画临本出版。1964 年创作的《工业的粮仓》入选当年全国综合性美术大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被同行誉为“百年经典”,推动了中国水彩画的发展。70 年代画年画,1965 年创作的《草原铁骑》,首版印刷 180 万份,创文革前

单幅画首版印刷之最,并连续十年受全国各地出版社邀请创办擦笔水彩年画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新年画骨干,成为当之无愧的擦笔水彩年画“教师爷”。70 年代后期,受艺术前辈丁正献振兴粉画的嘱托,放弃大有所成的水彩,全身心投入粉画传承工作至今。1984 年,粉画作品《泳装少女》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被评为优秀作品,开创了粉画入选全国综合性美展的先河。粉画《柯桥夕照》、《山城》、《水乡蝉声》相继在美国粉画展上获金奖,被誉为“粉画巨子”。并成功促成中国美协和苏州市政府联合举办了 2003 年和 2011 年的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粉画展,推动了中国粉画的繁荣和发展。

